

1【实地走访】受降地包公巷码头如今毫无踪迹

夏日酷暑，黑云压城。近日，记者来到了位于水东街的包公巷，这是水东东路与水东西路汇合的一条横街，包公巷码头曾紧靠东江边。如今，码头早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崭新的骑楼。现场几乎找不到受降的踪迹，没有任何标示。不时有居民路过，当记者谈及当年日军曾在此地投降，他们都颇感惊讶，游客更不必说。

“当年就是在这里，郭永镳师长作为代表，接受了日军投降！”惠州市岭南文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指着水东街骑楼前的一块空地介绍，1945年9月16日，驻惠州的日军投降。当天下午3时，靠码头的街道左右两旁和商店楼边，夹道排列着持枪的中国军队士兵。在左列士兵的前面整齐地站着三个日军将领。

随着几响长鸣的汽笛声，三艘从河源沿东江而下的火船至白鹅

峰下，受降军队靠近包公巷码头，台阶上出现了五六个手持冲锋枪和驳壳枪的中国士兵，分列两旁警戒。

“立正！”中方受降代表、师长郭永镳一行从台阶走到街口时，立即传来一声口令，场面顿时紧张严肃起来。这时，三个日军将领摘下军帽，同时将佩带的指挥刀从腰间取下，双手横托着放在胸前，耷拉着头以示敬礼和迎接。一声号令下，日军军旗全部倒下，刀枪落地。

郭永镳师长在日军面前停了下来，略点点头，仪式很快结束了。中日双方代表各自坐上事先安排好的小车，向着东新桥方向驶去。最后，约有一营全副武装的中国官兵也陆续离船登上包公巷码头，过府城来到十字街口，迅速组成四人纵队，按照连、排、班的战斗序列，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，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城。

2【历史回忆】锣鼓声震全城，人们声音都喊哑了

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，惠州老百姓异常激动。何志成介绍，当天一早，全城传出持续不断的爆竹声和人们的欢呼声。不少街坊邻里自动地走街串巷奔走相告：“中国军队返城了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！”

一群群市民自发地涌往闹市中山中山东路，看到久违的中国军队又重新出现在十字街头。他们双手持枪，警惕地站立在街道两旁，维持治安，疏导人群。街上到处都是看热闹的市民，秩序良好。

在东新桥头和中山公园前，分别搭起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竹木结构的简易牌楼，牌楼两旁悬挂着吴仕端先生撰的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劫后苍生，有新气象”，下联是“岭东雄郡，作受降城”，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，青少年喜笑颜开，老年人则多痛哭失声。

当天中午，传来在包公巷码头举行日军投降仪式消息，许多市民前往包公巷码头，想亲眼看看日军

投降的场面。包公巷码头总面积不足500平方米，附近三个街口及四周的骑楼下都挤满了市民。看到日军军旗倒下、刀枪落地，他们高呼“胜利”和“万岁”口号，几个绅士将毡帽扔到半空中。

举行受降仪式半个月后，惠州召开抗战胜利大会，随后进行了抗战胜利大游行。从下午6时，游行队伍在中山公园集中，接着从中山北、中山南路到榕树头过西支江浮桥，进入县城晒布场、咸鱼街，抵达水东街平一坊（今水东西）、平二坊（今水东东），再从西门口折回，经上塘街、下塘街后游行结束。

游行队伍所到之处，群众大放炮仗欢迎，其中水东街炮仗放得最多，街面堆积着厚厚的炮仗纸，人们从街面行过，如履厚棉。游行当晚，锣鼓声震全城，人们的呼声喊哑了，全城的酒卖光了，炮仗也卖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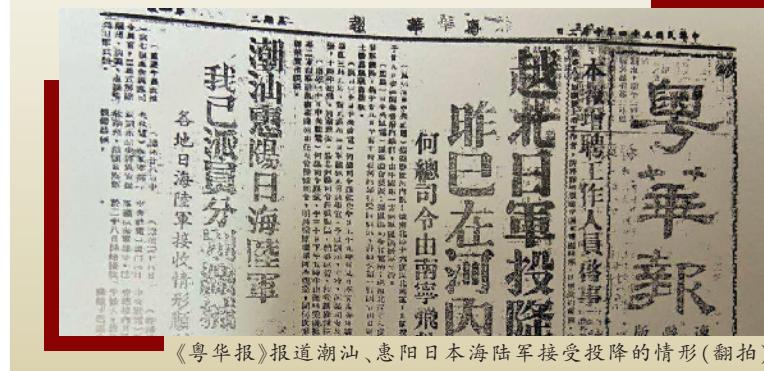
75年前，东江日军在惠州投降

如今受降遗址踪迹全无，专家呼吁建设标志性建筑

统筹策划/陈晓鹏 马勇 文/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 马勇

75年前的8月15日，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当年9月16日，东江日军在水东街包公巷码头向中国军队投降。当日锣鼓声震全城，遍地炮仗纸，人们从街面行过，脚底下软绵绵的。这是惠州乃至东江人民扬眉吐气的重要历史时刻。

75年如白驹过隙。羊城晚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，作为惠州抗战史极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，包公巷码头旧址周边几乎找不到受降的踪迹。当地居民少人知晓这段历史，仍在世的亲历者更是越来越少。对此，专家学者备感遗憾，呼吁在此地竖立纪念碑等标志性建筑物，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。



《粤华报》报道潮汕、惠阳日本海陆军接受投降的情形(翻拍)



何志成带领记者来到当年受降地点

据上海《申报》、加拿大《大汉公报》报道，惠州与广州、三水、海南岛同日接受日军投降。

为何惠州会被选作东江地区的受降地？何志成介绍，惠州一直都是东江流域乃至岭南的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军事和文化中心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各类物资在惠州集结，然后通过东江输送到粤北和内地，惠州因此成为了中日双方在华南战场上的必争之地。他说：

“惠州城前后四次沦陷，第四次沦陷时间更是长达9个月，日军重兵把守，驻

扎了最多的兵力，在这里受降，能给日军带来较大的挫败感。”

水东街曾经是惠州商贸最繁盛的地方，也是沦陷后惠州的重灾区。抗战初期，日寇烧杀抢掠，市民死伤无数，一把火烧掉了大半条街及200余间骑楼店铺。1941年水东街又一次遭日军破坏。因此选择水东街包公巷码头作为接受日军投降之地，更有雪耻的意味。何志成说，郭永镳专门从河源乘轮船赴惠州，接受日军投降，对此次受降的重视可见一斑。

“多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啊！至少要竖一个牌子或一块碑。”何志成遗憾地说，“人们走过这片土地，有没有看到过相关标志记载这里发生这个历史事件呢？没有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人们就会逐渐忘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，十分可惜。”

不仅包公巷码头一地，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，惠州留下了不少抗战旧址。中国军队在飞鹅岭多次阻击入侵惠州城的日本侵略军，不少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。西枝江边的沙下(今下埔滨江公园)更是惠州历史上惨

痛的一页，600多名无辜老百姓遭残忍屠杀，血水染红江水，惨案震惊南粤。但这些抗战旧址都缺乏相关标示，背后的革命历史、革命事迹、革命精神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

“不一定非要还原原貌，但应该要有所标记。”何志成建议，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利用，在包公巷码头、飞鹅岭、“沙下惨案”原址建设纪念碑等重要标志性建筑，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讲好当地的革命故事，如此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。

3【专家建议】多处抗战旧址都应建设标志物

据上海《申报》、加拿大《大汉公报》报道，惠州与广州、三水、海南岛同日接受日军投降。

为何惠州会被选作东江地区的受降地？何志成介绍，惠州一直都是东江流域乃至岭南的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军事和文化中心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各类物资在惠州集结，然后通过东江输送到粤北和内地，惠州因此成为了中日双方在华南战场上的必争之地。他说：

“惠州城前后四次沦陷，第四次沦陷时间更是长达9个月，日军重兵把守，驻

扎了最多的兵力，在这里受降，能给日军带来较大的挫败感。”

水东街曾经是惠州商贸最繁盛的地方，也是沦陷后惠州的重灾区。抗战初期，日寇烧杀抢掠，市民死伤无数，一把火烧掉了大半条街及200余间骑楼店铺。1941年水东街又一次遭日军破坏。因此选择水东街包公巷码头作为接受日军投降之地，更有雪耻的意味。何志成说，郭永镳专门从河源乘轮船赴惠州，接受日军投降，对此次受降的重视可见一斑。

“多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啊！至少要竖一个牌子或一块碑。”何志成遗憾地说，“人们走过这片土地，有没有看到过相关标志记载这里发生这个历史事件呢？没有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人们就会逐渐忘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，十分可惜。”

不仅包公巷码头一地，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，惠州留下了不少抗战旧址。中国军队在飞鹅岭多次阻击入侵惠州城的日本侵略军，不少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。西枝江边的沙下(今下埔滨江公园)更是惠州历史上惨

痛的一页，600多名无辜老百姓遭残忍屠杀，血水染红江水，惨案震惊南粤。但这些抗战旧址都缺乏相关标示，背后的革命历史、革命事迹、革命精神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

“不一定非要还原原貌，但应该要有所标记。”何志成建议，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利用，在包公巷码头、飞鹅岭、“沙下惨案”原址建设纪念碑等重要标志性建筑，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讲好当地的革命故事，如此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。

传统书室如何融入现代发展

专家建议：打造书室文化旅游综合体

统筹策划/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晓鹏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
实习生 钟培倪 聂雨

“千载讲堂人仰止，时从四百望峻嶒。”这是明代博罗人韩冕纪念宋代理学家罗从彦所作《谒豫章祠》中的诗句。据史料记载，自宋仁宗改革科举后，惠州崇文兴教，成为岭南地区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州县之一，书院林立、书室遍布，多数分布在罗浮山、西湖、潼湖等地。其中，位于深莞惠区域核心的仲恺高新区，拥有敦伦书室、美乾书室、南嵩书室、慈轩书室等百年书室，且多数集中在潼湖镇。

潼湖镇委书记钟小君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目前惠州市区镇三级部门计划挖掘潼湖镇书室文化，借助乡村振兴契机，将书室资源进行活化。同时，记者从仲恺区宣教文卫中心获悉，目前南嵩书室已被提名为惠州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，批复结果将于近期公示。

那么，传统书室目前保存状况如何？其文化价值在何处？如何进行活化开发？羊城晚报记者经过数日实地走访，逐一解开这些疑问。



现状

对研究近代教育有重要意义

沿着潼湖镇黄屋村委会门前的小道一直往前，穿过一排排饱含岁月痕迹、墙体斑驳的老屋，尽头便是敦伦书室。敦伦书室为二层砖木结构，青砖清水墙体建筑，门楣、窗楣、栏杆上的装饰带有西式风格。黄屋村委会书记黄灿坤说，敦伦书室对于研究近现代惠州教育文化具有非常大的意义，早在于2015年就被评为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。由南侧小门进入书室，便是天井，左右各有两进，一进有三间房，“总共有6间教室，我当时就在进门右侧的教室上课，但现在已经拆了。”曾在这里上过6年

学、今年86岁的黄谭带回忆道。进门左侧则有石砌，循着阶石来到二楼，栏杆上绿琉璃瓶式的矮柱装饰是书室特有的西式风格，站在阳台上，孩童们摇头读书、嬉戏打闹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。

在敦伦书室十公里开外的琥珀村，前后不到50米距离，有两间书室，分别为南嵩书室和慈轩书室。两个建筑均为清末建筑，但保存现状差别很大。南嵩书室由于有族人管理，现保存情况较好，但慈轩书室却因许久无人问津，墙体斑驳，青苔遍布，内部还有不少坍塌，但在屋内墙上，仍可看到“学习与生活”等字样。

沿着敦伦书室南侧小门进入书室，便是南嵩书室，左侧有石砌，右侧有石柱，柱子上刻有“敦伦书室”字样。书室内部装饰简朴，有木制桌椅，墙上挂着一些书画作品。右侧有石柱，柱子上刻有“敦伦书室”字样。书室内部装饰简朴，有木制桌椅，墙上挂着一些书画作品。

敦伦书室改造后内部一角

东江纵队成员曾在书室任教

在革命斗争年代，敦伦书室曾是东江纵队的秘密联络点，见证了东江流域辉煌的抗战历史。

1945年至1948年，黄卓如来到敦伦书室，以公开教师身份，秘密进行党组织活动，宣传抗日游击战争；并在潼湖地区建立了“打土匪、战恶势力”的农民抗日组织。敦伦书室成了抗战时期黄卓如等革命志士的对外联络窗口。

“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黄卓如是一边躲避国民党反动派，一边给我们上三年级的国语课。”黄明说，黄卓如教书育人很严格，还要求学生仪表得体。他在敦伦书室从教期间，为防止身份泄露，躲避追捕，夜晚在不同的人家借宿。他战斗于惠阳地区抗战前线的事迹，也带动了不少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

建议赋予书室更多新功能

传统书室该如何活化才受市民和游客欢迎？住在仲恺惠环街道的李先生表示，惠环到潼湖的距离较远，于他个人而言，书室对他不具有诱惑力，但他若能与亲子教育相结合，为人父的他坦言“乐意带小孩前往”。

在他看来，现惠州缺乏娱乐与教育相结合的亲子乐园，若能将现有书室串联起来，打造丰富的游戏环节，中间加入传统元素，比如让孩子们演绎惠州“江孝子”尊敬师长的故事，“相信会很受欢迎”。

在惠州市佳兆业上班的白领魏先生直言，他个人并不会独自到潼湖游玩，如果是作为团队出游的话，他希望有特色民宿及市区体验不到的游玩项目，比如他个人十分喜欢的CS、CF等枪击游戏以及真人模拟游戏，在他看来，年轻一代都会比较热衷于此类活动。

市民吴先生老家就在潼湖，他个人建议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，将书室改造为集书室、水吧一体的综合体，“既可以喝茶聊天，也可以品茶看书，一定会受欢迎”。

过往 已具备现代相似的教学制度

据介绍，敦伦书室的“敦”字意谓勉励，“伦”谓伦常，即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。自清末书室办学以来，敦伦书室便如其名一般勉励子孙、教育化人，为当地学生提供书香学舍之地。《弟子规》《大学》等儒学经典是敦伦书室国语学科的主要学习内容。黄谭带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，书室内开办了国语、地理、历史、算术、自然和劳作六门课。

当时的敦伦书室已经有了与现代相似的教学制度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敦伦书室已有了与现代相似的教学制度，明确上学时间为：上午7:00-12:00，下午2:00-5:00。

潼湖地势低洼，湿地多，书室临湖而建，门前不远就是湖滩，学生们放学后喜欢到湖边玩水抓鱼。黄谭带回忆道：“老师为了防止学生们下水，下课后就会在

生手上写字，只要字没了，就证明去玩水了，回来就要受处罚。”

敦伦书室是黄屋村里孩童们的启蒙之地，然而能像黄谭带一样，能够在书室内完成全部学业的，却仅有6人，如今只剩他与黄明两人健在。从总角到耄耋，同窗情谊延续了几十年，现在他们俩闲暇时，经常会在一起叹茶聊天……

能顺利在南嵩书室和慈轩书室完成全部学业的生也屈指可数，原因是家中经济压力大。但不同于敦伦书室的是，南嵩书室与慈轩书室在解放前就开设了夜校，村里的知识分子除教人识文断字外，还在传播革命思想。

97岁的张国荣曾为慈轩书室的老师，他告诉记者，夜校的上课时间为晚上7时到9时，村民们劳作完之后，就会往书室里赶：“这为村里没钱读书的人提供了学习机会，其实就是早期的扫盲班。”

未来 建议打造书室旅游融合体

文化教育中民间书室的发展代表

地，潼湖镇拥有历史文化教育的遗址珍宝：“传统民间书室对于潼湖发展科技小镇是难得的历史资源，应该积极进行保护与开发。”

包国滔表示，潼湖镇智慧生态科技小镇已规划在吸引高科企业、科研机构、高等学府的同村，开发利用好书室文化资源。包国滔建议，结合潼湖所具备的高科技资源，因地制宜地利用3D还原、云参观、虚拟场景、动画呈现等方式来保护和活化书室遗迹，建立书室旅游融合体。例如通过动画技术和3D还原技术，为游客展示清末民初的书室文化、民间故事等，通过传统和现代的结合，发挥清末民初潼湖书室在当代旅游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和优势。

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包国滔教授表示，作为岭南